

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九月二十四日）

邓颖超

同志们、朋友们：

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开了一个星期，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没有能够参加各小组的会，现在讲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杨成武同志说他是小学生，我觉得我还是个新的学生。同志们知道我过去做过统战工作，现在还在做统战工作，还参加统战活动，但是，对于统战机关内部的许多工作，包括文史资料工作和其他方面很多工作，我没有直接参加，所以我说我是新学生。在这方面，我还得向大家学习。如果说要说些什么意见的话，那也是我选看了一些会议参考文件和简报，从那里头考虑了一点不成熟的个人的意见。我今天的讲话，没有经过主席会议的讨论，不能代表集体，只能作为个人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我想，我们政协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根据我们政协机构的性质，包括参加政协的单位，包括政协的几个委员会和十几个工作组，要进行协商，

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这些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今天我们不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会议是文史资料工作的专业性会议，我仅就这个专门问题来讲一点意见。我觉得政协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就是属于这一类。它跟其他方面的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完全相同。它需要坐在那个地方，动脑子、看东西、思考、研究。所以，从形式上，从工作内容上看，我觉得这个工作是属于静的工作，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甚至连政协各个组的工作都可以包括到它里头去。它可以扩大统一战线的对象和统一战线的影响，发挥我们对人民、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看起来是一动一静，截然不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因此，我们说这两部分工作，都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说静的工作又可以转变为活动性的工作呢？我们不去讲征集的时候要活动，就以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来说吧，文史资料工作是能够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的。你们会上发的材料和第九号简报都说明了这方面的好经验。在《广东试向港澳和海外征集史料的情况和反映》这个材料中举到两个例子：一是罗翼群、一是郭典三，我们文史资料登了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后代、亲属看到后，很受感动，声言：只要祖国需要一定回来，并且表示今后要为促使台湾回归祖国和祖国“四化”多做贡献，发扬祖辈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使另外一些人缩小了同我们的距离，有的甚至考虑回国定居。这不是把静的工作又变为动的工作了吗？所以，我们对文史资料工作不仅要重视它，而且要像刚才杨成

武副主席说的那样来进行。他的发言，我都拥护。我只补充一点，我们文史资料工作是要埋头伏案在那儿编辑，然后付印出版，看起来好像是单纯的文字工作，其实不然，因为我们的资料拿出去以后马上就会起到活的作用。这个文字工作就跟我们统一战线的其他活动性工作一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作形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看到了文史资料工作的作用和影响。再说一点，就是今后要注意提高文史资料的质量。要广征精选，对收到的一些材料，不要因不符合我们的观点，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符合我们原来的原则就轻视它。只有实行广征精选，文史资料出版的质量才能提高，它的作用也才能随之而扩大。

二、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看，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是非常必要的。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我在政协常委会上提出的建议，常委会上没人反对，后来在主席会议上又作了研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是根据常委会和主席会议的决定进行准备工作的。在这里我声明，个人的意见，变成了集体的意见，就不再是个人的意见了。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在这里提一下，我们对于哪个人说的话，只能说是他讲了什么话，要少用什么“指示”。因为个人的意见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全面的，甚至是不成熟的；而且个人往往只是提出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我这次建议，也仅仅是提出问题，不算什么指示。而解决问题是靠今天在座的从各地来的有着文史资料工作的实践和经验的同志们，靠在会议领导小组领导下，大家共同讨论。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得到收获，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点，我要特别讲一讲，因为过去常常把个人意见当作指示，是指示，就好像非执行不可。现在，我们要强调民主集

中制，不要突出个人，个人的作用总是有限的。长期以来，我们往往在一些很具体很小的问题上，受着这种或那种不合宜的、旧习惯的约束，比如凡是负责同志的话都叫指示，似乎习以为常了。我看这个方式，这个习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应当改一改。

召开这次文史工作会议，同志们都讲是必要的。而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根据是什么呢？是根据在人大六届一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以后，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应该跟上两个大会所提出的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第三次文史工作会议是一九八〇年开的，至今已三年了，经过这段实践，我们也需要总结工作，回顾过去，发扬成绩，找出弱点和不足的地方，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以适应今天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通过开会的形式，从事共同工作的同志大家在一起总结。这个方式是必要的。这种总结的会议有大有小，有各种类别，有专题性会议，有综合性会议。我们呢，是总结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是为了使我们的工作今后得到改进提高，更有利于完成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无论什么工作，在一定时期内都应该总结，不能不作检查，任其自流。我觉得有时候在有些情况下是总结不够的。比如拿我们的国家计划来讲，（我讲的是过去罗），对每年的年度计划，缺少总结检查，所以我们执行计划的情况，在第一季度不怎的，第二季度好像进行得还好，三季度再一检查，离计划距离还很大呢，于是到第四季度就拚命地赶，赶着完成任务，结果呢，偏重于数量的完成，质量怎样就难说了。我为什么说这点意见呢？我是希望同志们今后重视总结工作和检查工作。一个季度、一个年度，甚至

对某一类或某个专题资料发表以后，根据得到的反映，做一次总结，做一次检查，这样，就可以及时改进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总结工作，不是工作的终止，而是工作的新开端，是为了有利于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今天着重讲讲总结工作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你们的简报中已经肯定是有收获的，解决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达到了提高工作质量的目的。我个人与你们有同感。会议的一个收获就是以后我们在编辑文史资料的时候，审查征集来的稿子的时候，有了明确的目标，就是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就是要看我们征集出版的资料对于爱国主义，对于我们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后代是不是有利？有了明确的目标，在选择资料方面就容易统一思想，分歧也可以解决。不过，我们光明确目标还不行，还要确认求实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你们的简报中说，要做到实事求是是不太容易的，是这样。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就要有所根据吧。实事求是的材料，使人看到有所收益，能使他认识一个问题，了解一个问题，增加他的认识，这就提高了他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最近我看到报上登的民国史的资料，有一篇写“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文章不长，在座同志可能看了。“四大家族”就是蒋、宋、孔、陈，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座大山中的第三座——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我们一定要把它推翻。但是到底这“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是怎样形成的，怎么发展起来的，它又是如何促进了国民党政府的灭亡？《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讲的非常好，都是讲事实，没有什么议论，没有什么水份，我推荐给同志们都看一看。我们的文史资料恐怕也应该在文字和内容方面加

以注意，我们编这类材料时，不能够加于评论。只能以原稿为基础，对来稿进行核对，资料不足的，再想法补充，但不能加上编者的评论、议论；否则，就改变了文史资料本来的性质。实事求是，就是要合乎历史，合乎客观存在。客观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实事求是，就是要求对一件事、一个问题全面地去看、去研究，不能有所偏废，只重这面，不重那面。说这个人好，就光说他好，不能说他坏，这还有什么实事求是呢？拿一件事情来说，光说这件事情收获多大，成绩多大，怎么样胜利了，但是不能说它当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说这件事情的不足之处，这样做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片面性。同志们说实事求是是不容易做到，问题就是在这里。但是，有没有办法做好呢？有。这次你们也肯定了，杨成武同志讲话也讲到了，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人、看事。对一个人，要历史地、全面地看，切不可只看到他突出的一点，就加以评价。对于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要用历史的观点而不是从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来写东西、审查东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材料、编写材料，那我们材料的质量当然就会提高，有科学性，有说服力，使人感受到益处，受到启发和影响。

三、我看有这么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收到的各方面的材料怎么处理？是来多少登多少，来什么登什么，还是应当定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征集、处理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资料要有分工，有协作。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要是征集出版近现代史资料，属于党史和党的军事史材料如果送来了，可根据分工协作的精神，将一些稿子交

给有关单位去处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开发表还是内部发表，也应有个区别。有些比较长的、有份量的资料，可以作为专题出单行本。这个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

总的看，开这个会是有利于我们改进和提高工作的，能使文史资料工作更好地发挥它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这里我再提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那么，写卖国贼、反动派的材料我们还要不要征集？要不要出版？我请同志们研究，首先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来研究。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教育人民，光有正面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有反面的材料。我们光说某某卖国了，我们要爱国，某某是反革命，我们要革命，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把事实材料拿出来。比如袁世凯，是怎么卖国的？西太后垂帘听政，可以不可以写？我觉得可以写。写哪些呢？写她卖国啊，投降啊，对帝国主义屈膝啊，这样人民才会懂得，我们要爱什么样的国家，国家要由什么样的人来掌权。请你们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们党常说光有正面的经验，没有反面的经验还不够、还不足呢？反面教材可以使我们知道为什么要反，为什么要爱。我觉得我们文史资料可以收集编辑一些反面的材料、敌人的材料。

我看到有个简报写到登了康有为、章太炎、张伯苓的材料，这些材料我没有看，不能提意见。但是写个人的材料，写现代、近代著名人物的传略也好，写他的历史也好，我们都要注意全面地来写，力求避免片面性。我们搞近代史料、现代史料，这非常好，可以由近及远。现在我们许多青年，包括中年，对五、六十年前的事情都不甚清楚，不甚了解。

《人民日报》有个专栏，叫做“学点民国史”，我觉得民国

以来的历史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值得写的，应该让我们活着的老年人和中青年人都知道一下。如“四大家族”的材料我看了，对我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去我光知道“四大家族”他们是官僚资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我们要打倒它。但是，它是怎样发家的我不知道，看了以后才知道他们要尽各种手段，把国家财富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搜刮到他们四家手里，对其他的他们还有控制权，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要打倒啊！我再给你们讲个非常简单，也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深思的事情，就是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作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件事情他的侄儿侄女都不知道。“文革”中人家提出来了，他们来问我，这下对我们敲了警钟，这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缺少历史的教育，一方面固然事情忙，另方面好像还用不着告诉他们，哪晓得告诉晚了，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跨党分子，毫不奇怪，但那些年轻的红卫兵就不理解，共产党还加入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有些秘密共产党员被安排在国民党机关，后来国民党实行独裁，实行法西斯专政，对于主张抗日、主张团结、主张进步的分子，稍微看出苗头的就要抓人。这些人的确不是他们的人，是我们没有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是我们派到国民党的机关去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是为了抗战救国，不是什么挖国民党的墙脚。“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共，这些同志不能再在国民党统治区呆下去了，我们只好赶紧把这些人的疏散撤退。解放以后，这些人到了我们一些机关工作，在我们妇联的较多，结果在“文革”中这些人就挨整得厉害，甚至于说，妇联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把我们党领导下的公开的全国妇女联合会竟说成

这样！过去在国民党机关是隐藏有秘密共产党员的，“文革”中，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也不跟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所以就搞错了一些人。最大的案子是新疆的案子，你们听说了。盛世才拘捕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也包括无党派爱国人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人都被打成了“叛徒”。实际呢，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周恩来同志跟张治中这个老朋友交涉，要他把这部分人释放。当时张治中在新疆，是蒋介石派他去解决新疆问题的。他办了这件事，把这些人放了，都送回延安了。建国以后，这些同志撒在各个部门。“文革”中红卫兵追问历史，噢，你是在新疆被捕过的，那都是叛徒。这个问题可费了大劲呢，我们的同志为这事挨整的不少。有的受了很大的委屈，有的人得到保护就好一些。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不仅要“抢救”健在的老一辈的历史，就是从民国成立以来，孙中山怎么当总统，他的总统为什么当不长？军阀怎么割据、混战，这些材料，恐怕对我们中、青年都是很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我建议是不是在近现代史中再划一下，划出一个民国史。

我今天没有多加思考，仅把个人的感触在这里简要提一提，供同志们参考，起到一点相互切磋之意。开过这个会以后，我们的工作该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会议九号简报上一段话，我把它念一念：“发言的同志一致肯定了召开这次会议的意义，认为：总结中响亮地提出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既符合于新时期统一战线为完成三大任务所发出的大团结、大统一的号召，也符合于我国近代、现代的历史实际，是我们进一步做好文史资料工作的指导思想；闻之使人豁然开朗，鼓舞奋起，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增

强了胜利的信心。”我和你们意见是一致的，这段话就作为我今天这个没有准备的讲话的结束语，作为我讲话的一个总结。开完会以后，会是散了，大家的责任却是加重了，回去以后，要自己振奋，还要鼓舞其他人和我们一起振奋。这样，我们才能思想一致、认识一致、步调一致地进行文史资料工作。我相信，文史资料工作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发挥更多的作用，来扩大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会议结束了，新的工作又开始了。我愿与同志们一同努力，今后对文史资料要尽量地翻一翻，不能像过去那样，是会外人，旁观者，可看可不看，没有时间就不看。我希望，凡在政协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层人员，对于文史资料应当比过去更为重视。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文史资料是出给别人看的，自己没时间就可以不看。这种态度现在看来不行了，应当改一改。我虽然这样说了，但究竟能看多少也很难向同志们作出什么保证，不过我很愿意在这方面跟同志们共同努力，把工作做好。

转自一九八四年政协会刊（第一期）

人民政协的历史发展

从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协产生起，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七年的历史。人民政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民政协的产生和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一九四八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共中央于五月一日发出号召，提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号召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赞成。一九四九年六月，在中共中央的提议下，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了常务委员会。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有个历史缘由。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两党谈判鉴定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了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青年党等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在中国人民中是有影响的。为了区别于一九四六年的旧政协，人民政协简称为新政协。一九四九年九月，在人民解放战争基本取得全国范围胜利的形势下，在北平（即现在的北京）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具有极其广泛的代表性，参加会议的代表总数为六百六十二人，共有四十五个单位，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宗教界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体现了我国统一战线的空前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由于当时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普选的条件还不成熟，这次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人民政协又执行着统一战线组织的任务。

在建国后的头几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依据《共同纲领》进行了各项工作，对于团结、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反对国内外敌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行社会变革，发展我国统一战线，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阶段，人民政协结束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经过普选产生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举行，成为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纲领》的基本内容已经列入宪法，它已经为宪法所代替。同年十二月召开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鉴于政协任务的变化，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规定了人民政协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基础组成，必要时可以吸收个人参加，并应有适当名额的少数民族和国外华侨的代表；依据宪法的原则，制定了参加政协各单位和个人应遵守的共同准则。《章程》宣告：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是人民政协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

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仍然需要单独存在，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这次会议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政协的主要任务是：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名单和各级人民政协组成人员进行协商；协助国家机关，推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生活中各阶级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密切联系各方面的人民群众，向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协商和处理人民政协内部和党派团体之间的合作问题；协商国际问题，开展人民政协的外事活动；在自愿基础上，组织各界人士学习马列主义和时事政治，进行思想改造。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同志为政协主席。从这届政协起，政协的组织形式由原来的政协全体会议、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三层，改为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两层。

从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到“文化大革命”前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的十多年中，政协委员的名额陆续有所增加，团结面不断扩大，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人民政协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种爱国力量，活跃国家的政治生活，发扬人民民主，推动各种社会力量为实现党和国家的任务，以及扩大国际活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疯狂破坏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叫嚷“政治岂能协商”，诬蔑人民政协是“牛鬼蛇神的窝子”。他们肆意践踏党的各项统战政策，对大批政协委员和各界爱国人士进行打击和迫害，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下，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第四阶段，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开展，人民政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九七八年二月，召开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政协新的章程，选举了邓小平同志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之后，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和一九八〇年八月，又相继召开了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二次和三次会议。各级人民政协，也相继恢复和建立，开展和加强了工作。一九八三年六月，召开了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了邓颖超同志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现有委员二千零二十名，委员人数越来越多，团结面越来越广，这反映了我国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大团结。近年来，各级政协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能，工作日益充实和活跃，对我国的四化建设，统一祖国大业，维护世界和平，对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附：历届全国政协主席、 副主席及秘书长名单：

（一）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李济深 沈钧儒 郭沫若 陈叔通

秘书长： 李维汉

（1949年10月9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名誉主席：毛泽东

主 席：周恩来

副主席：宋庆龄(女)董必武 李济深 张 澜 郭沫若
彭 真 沈钧儒 黄炎培 何香凝(女)李维汉
李四光 陈叔通 章伯钧 陈嘉庚 包尔汉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秘书长：邢西萍

(1954年12月25日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三) 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名誉主席：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

副主席：彭 真 李济深 郭沫若 沈钧儒 黄炎培
李维汉 李四光 陈叔通 陈嘉庚 包尔汉
陈 毅 康 生 帕巴拉·格列朗杰
阿 沛·阿旺晋美

秘书长：徐 冰

(1959年4月28日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在1960年4月11日全国政协第三届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增补何香凝(女)为副主席

(四) 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名誉主席：毛泽东

主席：周恩来

副主席：彭 真 陈 毅 叶剑英 黄炎培 陈叔通
刘澜涛 宋任穷 徐 冰 高崇民 蔡延锴
韦国清 邓子恢 李四光 傅作义 滕代远
谢觉哉 沈雁冰 李烛尘 帕巴拉·格列朗杰
许德珩 李德全(女) 马叙伦

秘书长：平杰三

(1965年1月5日在全国政协第四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五) 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主 席：邓小平

副 主 席：乌兰夫 韦国清 彭 冲 赵紫阳 郭沫若
宋任穷 沈雁冰 许德珩 欧阳钦 史良(女)
朱蕴山 康克清(女) 季 方 王首道 杨静仁
张 冲 帕巴拉·格列朗杰 周建人 庄希泉
胡子昂 荣毅仁 童第周

秘 书 长：齐燕铭

(1978年3月8日在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1、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增选副主席、补选秘书长名单

副主席： 刘澜涛 陆定一 李维汉 胡愈之 王昆仑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秘书长： 刘澜涛(兼)

(1979年6月28日在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2、第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增选副主席名单

副主席： 何长工 肖 克 程子华 杨秀峰 沙千里
包尔汉 周培源 钱昌照

(1980年9月12日在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三次会议上通过)

3、在第三次会上根据中共中央建议不再兼任副主席的名单：

韦国清 彭 冲 赵紫阳 宋任穷 杨静仁

4、第五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增选副主席名单

副主席： 刘 斐 董其武

(六) 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会

主 席：邓颖超（女）

副 主 席：杨静仁 刘澜涛 陆定一 程子华 康克清（女）

季 方 庄希泉 帕巴拉·格列朗杰 胡子昂

王昆仑 钱昌照 董其武 陶峙岳 周叔弢

杨成武 肖 华 陈再道 吕正操 周建人

周培源 包尔汉 缪云台 王光英 邓兆祥

费孝通 赵朴初 叶圣陶 屈 武 巴 金

秘书长：彭友今

（1983年6月17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一次会议上通过）

1、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增选副主席名单：

马文瑞 茅以升 刘靖基

（1984年5月26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二次会议上通过）

2、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增选副主席名单：

华罗庚

（1985年4月8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三次会议上通过）

3、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十次常委会议同意彭友今辞去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任命周绍铮为代理秘书长。

（1985年10月8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

4、第六届全国政协第四次会议增选副主席、补选秘书长名单：

副主席：王恩茂 钱学森 雷洁琼（女）

秘书长：周绍铮

（1986年4月11日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通过）

转自《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文件》

见1986年5月24日《广东省政协办公厅资料汇编》